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00110

· 三农问题 ·

农民合作社的基本能力对其规范程度的影响^{*}

——以内蒙古多伦县为例

樊胜岳, 梁宇程^{**}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目的] 文章旨在实证分析农牧交错区农民合作社的基本能力对合作社规范程度的影响, 农民合作社大规模发展的同时, 合作社中大量不规范现象的存在, 致使合作社难以发挥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的作用, 也使国家对合作社的各项扶持惠农政策落空, 严重影响了合作社事业的健康发展。目前对于合作社“规范性”问题的特征与成因的分析多以理论思辨和个案探讨为主, 并且研究对象多是南方山地丘陵地带的农民合作社。[方法] 研究以农民合作社为对象, 采用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系统抽样得来的77个合作社横截面数据, 通过系统收集的各合作社章程、惠顾返还数据及决策权分配情况作为合作社规范程度的考核指标。[结果] 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理事长身份、信用等级、政府项目支持和销售市场都会显著影响合作社的规范程度而合作社的内部社会关系和股东背景在合作社规范程度方面无显著影响, 拥有更好的制度表现和更广的销售市场的合作社更可能是规范合作社。[结论] 合作社的基本能力对其规范程度有显著影响, 农村能人担任理事长, 并且股权结构更加平均分配的合作社更大概率是规范合作社。而外部支持如政府项目、信用等级和销售市场, 对合作社规范程度也有显著影响。该研究从基本能力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解释了农民合作社规范程度的影响因素, 为农民合作社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参考案例。

关键词 农民合作社 基本能力 农牧交错区 规范合作社 农村能人

中图分类号: F3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121[2020]01074-08

0 引言

合作社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组织, 是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制创新的一个新亮点^[1]。截止2017年4月底, 全国依法登记农民合作社188.8万家, 是2007年底农民合作社法颁布施行初期的73倍, 平均每个行政村有3家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到全国农户总数的46.1%, 社均成员60户^①。在农民合作社大规模发展的同时, 合作社中大量不规范现象的存在, 致使合作社难以发挥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的作用, 也使国家对合作社的各项扶持惠农政策落空, 严重影响了合作社事业的健康发展^[2-3]。“空壳”合作社与合作社“规范性”问题^[4-5]是目前研究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不规范的合作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占用合作社的发展空间, 导致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或错误配置, 并且可能对今后合作社发展方向起到错误的示范^[6-7]。了解不规范合作社的成因, 也就成为解决大量存在的合作社“不规范”困境的突破口,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已有许多研究探讨了合作社“规范性”问题的特征与成因, 分析了规范的合作社的具体评判标准, 考察了“不规范”的合作社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2,8-10]。但总体来说, 该领域的研究主

收稿日期: 2018-06-14

作者简介: 樊胜岳(1962—), 男, 山东郯城人,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资源环境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发展

※通讯作者: 梁宇程(1993—), 男, 湖南衡阳人, 硕士生。研究方向: 资源环境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发展。Email: 594274409@qq.com

*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沙漠化治理政策绩效评价与校验”(41371529); “制度因素对沙漠化影响的定量分析”(41071353)

① 数据来源: 人大新闻网 <http://npc.people.com.cn/n1/2017/0630/c14576-29375343.html>. 2017-06-30

要以理论思辨和个案探讨为主,基于基本能力的研究较少,并且多以南方山地丘陵地带的农民合作社为研究对象,以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合作社为研究对象进行的研究很少。

文章认为合作社“不规范”困境产生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合作社的基本能力。依据 Sen 提出的“能力是一个人使资源发挥作用的基础”^[11],为了探究基本能力对广泛存在的农牧交错区农民合作社“规范”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对多伦县农民合作社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且用模型计算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社股权结构与理事长身份都对合作社的规范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股权结构越平均的合作社为规范合作社的概率越高,理事长是农村能人的合作社也更有可能是规范合作社。该文还发现,制度表现对合作社规范发展有较大的帮助,市场的拓展也对合作社的规范程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该文对进一步理解合作社的基本能力与合作社规范发展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1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计

1.1 理论分析

农民合作社是一种制度安排,净的经济回报(预期收益)是影响农民做出加入或退出合作社决策的关键性因素^[12]。以合作社为基本单位来看,能力指导和限制了合作社的选择与行动,因此改变了合作社的发展轨迹,使合作社在制度表现和销售表现上产生分化,从而在经济效益上有所不同,造成不同合作社内农民的净经济回报与成立合作社的预期收益之间的大小关系产生区别,一些社员在得不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纷纷选择退社另谋生路,从而最终导致部分合作社成为“不规范”的合作社。因此,能力可以被解释为不仅导致合作社不同的经济结果,而且与合作社的“规范性”问题具有一定关系。

大量文献表明,生活条件和知识是基本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影响到个人对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影响个人可以实现或选择做什么的社会资本,并且能够捕捉个人在影响经济生产中的福利的作用^[13-15]。另外,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技能和知识形式的能力被认为是引起社会变革的因素,如制度变迁^[16]。知识往往不是反映在教育程度上,不能和学识划等号,而是综合性的包括经验知识等,表现在人的身份上,有着更多的知识储备、更好的学习能力的人在农村也被称为“农村能人”^[17-18]或“乡村精英”^[19],同时,这一部分人也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合作社理事长的身份就成为着重考察的基本能力指标。

1.2 模型设计

参考邓衡山(2014)等学者在《真正的农民合作社为何在中国难寻?——一个框架性解释与经验事实》中提出的规范合作社要求^[20],结合多伦县的实地调研,将合作社分成了3类:第一类是“空壳合作社”,自成立之后就不曾有任何符合合作社要求的集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且也不会再办理任何维持合作社的有效状态所需的相关手续,甚至其社员都不知道自己加入了合作社;第二类是“不规范合作社”,其在生产经营一段时间后,社员由于净经济回报达不到成立合作社的预期收益,纷纷在生产经营上退社,以市场模式继续着销售活动,但合作社仍然进行如“核准登记、重办税务手续”等维持合作社的存活状态所需的相关手续;第三类是“规范合作社”,其符合合作社的本质规定,合作社内所有者与惠顾者统一,并且有着合作的生产经营活动。

“空壳合作社”占到了多伦县合作社总数的76.42%,由于其已经不是客观存在的合作社,因此不是该文的研究对象。“不规范”合作社与“规范”合作社作为该文的研究对象,共同占到了多伦县合作社总数的23.58%。该文的因变量为非零的连续变量,根据假设构建模型为:

$$D = \beta_0 + \beta_1 C + \beta_2 I + \beta_3 S + u \quad (\text{模型 1})$$

式(1)中, D (degree)代表合作社的规范程度,是因变量。自变量有3个,分别是 C (basic capability)代表基本能力、 I (institution performance)代表制度表现、 S (selling performance)代表销售表现, u 为残差,即方程模型中无法预测或解释到的误差值。

基本能力的各项指标包括合作社规模、距离、技术、股东背景、股权结构、内部社会关系、合作社理事长的身份、教育程度、额外企业。合作社的规模代表了可能的人均成本,成本越小则代表利润空间更

大；合作社的距离是合作社的注册地到县城中心位置（县政府）的路程，选择的是由水泥铺筑的路况良好的最短车程，统一使用百度地图 V10.0 版测量；合作社技术是指合作社拥有突出的与所属行业有关的技术（如：养殖业——羊胚胎移植技术等）；合作社的股东背景是作为合作社的社会资本^[21]的参考量之一，通过合作社股东额外加入的合作社数量与作为股东加入的公司数量来衡量，股东加入其他合作社和公司可以代表促进合作社与外部的交流，搭建外部社会网络，这对合作社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22]；合作社股权结构和合作社内部社会关系，股权结构代表了合作社的权利分配，内部社会关系是通过合作社其他股东与理事长之间的直系与旁系血缘关系以及股东之间的直系与旁系血缘关系来衡量的，由于农村是一个小圈子社会，一个村的村民之间都非常熟悉，因此在社会关系测量中不考虑邻里和朋友关系；合作社理事长的教育程度、身份、额外企业都属于理事长的基本能力范畴，理事长的能力是合作社发展的关键之一^[23]，教育程度此前已述；理事长身份则指理事长是否是“农村能人”^[24]，这一方面代表了理事长的知识水平和生活条件，一方面也代表了理事长的社会资本；理事长额外企业是研究者较少关注的一个指标，是指理事长以股东或管理者身份参与的其他企业和合作社的数量。表 1 中详细列出了各项变量的解释及测量方法。根据以上理论，假设：

H1：合作社基本能力对合作社规范程度有显著影响；

制度表现分为合作社信用等级与政府扶持的力度（简称：政府项目），政府扶持力度是通过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给予合作社的项目资金和直接补助资金来衡量^[25]。

销售表现分为 3 部分：合作社是否获得认证，如：无公害认证、绿色认证等；合作社是否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合作社的主要产品市场为周边市场还是拓展到周边内蒙古、河北地区以外的市场。假设：

H2：合作社制度表现对合作社规范程度有显著影响；

H3：合作社销售表现对合作社规范程度也有显著影响。

为了验证 H1、H2 和 H3，又根据模型 1 设计了模型 2 与模型 3：

$$D = \beta_0 + \beta_2 I + \beta_3 S + u \quad (\text{模型 2})$$

$$D = \beta_0 + \beta_1 C + u \quad (\text{模型 3})$$

表 1 变量的解释及测量方法

变量	解释及测量方法	变量	解释及测量方法
合作社规范程度	“规范”合作社赋值为 1，“不规范”合作社赋值 0	是否林业合作社	“是”赋值 1，“否”赋值 0
是否农业合作社	“是”赋值 1，“否”赋值 0	是否养殖合作社	“是”赋值 1，“否”赋值 0
规模	合作社注册资本：合作社股东数量	距离	距县城中心的最短距离，选择可通车的平整水泥路
股东背景	合作社除理事长外股东入股或参与管理的企业/合作社数量	技术	合作社是否拥有突出的与所属行业有关的技术，“是”赋值 1，“否”赋值 0
理事长教育程度	“小学毕业”赋值 1，“中学及中专毕业”赋值 2，“大学、大专及以上毕业”赋值 3	理事长身份	理事长是否为“农村能人、乡村精英”，“是”赋值 1，“否”赋值 0
理事长额外企业	理事长入股或参与管理的企业/合作社数量	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平均”赋值 1，理事长出资“较突出”赋值 2，“突出”赋值 3；“较突出”为理事长出资比例在 20%~50%之间，“突出”则大于等于 50%
内部社会关系	通过合作社其他股东与理事长之间的直系与旁系血缘关系以及股东之间的直系与旁系血缘关系计算而得	信用等级	根据官方信用评级，“最高级”赋值 3，“无资格”赋值 0，以此类推
政府项目	根据政府项目扶持和补助的资金衡量，单位“十万元”	认证	合作社是否获得认证，“是”赋值 1，“否”赋值 0
市场	合作社面向的主要市场为“当地及周边市场”赋值 0，主要市场更广阔赋值 1	销售渠道	合作社是否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是”赋值 1，“否”赋值 0

2 研究背景与数据收集

2.1 研究区域背景

多伦县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带地理和气候环境^①。根据2016年最新统计资料,全县总人口为11.0516万人,其中乡村人口占到了65.82%。总耕地面积达到5.19万hm²,主要作物为玉米、青饲、薯类、莜麦、蔬菜、小麦等。已利用草原总面积达到21.547万hm²(323.2万亩),主要养殖牲畜为肉牛、奶牛、羊、猪4类^②;自多伦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展合作社注册工作之后,多伦县的合作社数量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加,截止2017年第一季度,在工商局登记在案的合作社已经达到1005家,整体的注册资本达到了23亿之多,而多伦县的GDP历年来最高也只有80亿元。

多伦县作为北京沙尘暴的主要源头之一,中国政府常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③④}进行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绿化工程^⑤,因此合作社主要分为农业专业合作社、林业专业合作社、养殖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机械化服务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机合作社”)4种类型,这4类合作社代表了典型的农牧交错带合作社类型,其中前3类合作社各占合作社总数的30%,农机合作社占10%。多伦县没有“外来公司+农户”形式的合作社,有个别合作社经由农户的发展而注册公司,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司+农户”形式的合作社。

2.2 数据收集方法

该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是在2017年6月至2017年8月,有关多伦县1005个合作社的档案资料、官方统计资料和实地访谈调研得到的第一手数据。第一阶段,在正式调研前,笔者于5月到达多伦县的3家合作社中进行了实地走访,并与理事长共同生活,进行深度交流,以确定问卷中每一问题的合理性、可读性与可回答性,根据理事长们的建议做了多次修改。第二阶段,从多伦县农业牧业与生态保护局、工商局等部门获得官方的统计资料和档案资料,总计是1005家合作社;第三阶段,建立抽样框架,以筛选出来的237家“不规范”合作社和“规范”合作社作为两个一级抽样层,根据合作社所属的不同行业进行做区分(农业、林业、养殖业、农机)按比例作为4个二级抽样区,从各层的各区中按比例以相等的概率随机选择合作社。最后一个阶段,在村长或村民的帮助下,对已选择好的合作社进行访谈,调查收集了所需要的数据。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系统地收集了各合作社的章程、惠顾返还数据及决策权分配情况并将其作为合作社规范程度的考核指标,满足“规范”要求的合作社共计24家。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由表2可以看出,合作社制度表现中,信用等级和政府项目的标准差都较大,说明合作社在制度表现上差距较大,尤其是政府项目,销售表现则相对要接近一些,但获得认证的合作社较少(均值为0.190)。基本能力方面,样本中有突出技术的合作社太少(均值为0.040),理事长为农村能人的合作社接近一半(均值为0.550),而合作社股权结构均值大于2,说明合作社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严重。

①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4%BC%A6%E5%8E%BF/5454021?fr=aladdin>

② 《内蒙古多伦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二零一六年度》

③ 仅2013年,多伦县造林绿化投资6.2亿元,完成沙区百万亩樟子松造林工程2万hm²;省道308线和多蔡线通道绿化里程70km,实现了县境内主要公路通道绿化率100%目标。来源:凤凰新闻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017/10874496_0.shtml 2017-09-13

④ 2016年,多伦县人民政府与蒙草生态控股子公司签订了总价9.2亿元的“多伦生态环境建设及绿化景观改造工程投融资建设框架协议”。来源:中金在线 <http://sc.stock.cnfol.com/jysgg/20160927/23537524.shtml> 2017-09-13

⑤ 自2000—2015年,多伦县林地面积由3.6万hm²增加到19.5万hm²,森林覆盖率由6.8%高到31%,项目林区草植被盖度由不足30%高到85%以上。“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多伦县计划建成10个百万亩、100个十万亩、1000个万亩的防沙治沙基地。来源: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5/0823/12/B1N00B3T000146BE.html> 2017-09-13

同时,对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①,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大(绝对值小于0.200),但理事长身份与股权结构的相关性绝对值超过了0.8,为-0.874,这主要是由于农村能人在合作社中的出资比例偏大造成的。因此就这两个的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新变量的回归结果有较大偏差,不再单独考虑其交互作用的回归结果。另外可以看到理事长身份与信用资格、市场的相关性分别达到了0.300、0.252,说明农村能人对合作社申请贷款和扩展市场会起到一定的帮助。股权结构与信用资格的相关性绝对值超过了0.5,为-0.520,说明股权结构更平均的合作社的信用等级往往更高。

表3中列出了运用SPSS22.0的二元Logistics线性分析的回归结果。首先将基本能力的各项指标作为主要变量,对合作社规范程度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模型3所示。

合作社基本能力中的理事长身份、教育程度及合作社股权结构均对合作社规范程度有显著影响,其中理事长身份是显著的正向影响,理事长教育程度和合作社股权结构则有显著的反向影响,但是不能就此轻易下结论说基本能力中的这3个因素对合作社规范程度有显著影响,还需考虑到合作社的制度表现和销售表现这两个外部性影响。

然后将制度表现和销售表现对合作社规范程度做了回归,结果如模型2所示。制度表现中的政府项目以及销售表现中的认证与市场均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项目和市场是正向影响,认证是反向影响。并且解释变量的回归平方和也高于模型1。因此,制度表现和销售表现作为合作社规范程度的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应被排除在模型外。

于是综合基本能力、制度表现以及销售表现对合作社规范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模型3所示。对比3个模型的 R^2 ,模型3的解释变量回归平方和最高(接近0.7),因此,以模型3为合作社规范程度的影响因素的参考模型。在模型3中,理事长身份、合作社股权结构、政府项目和市场均有显著影响,同时,合作社规模和信用等级通过了显著性为10%的检验($\text{sig}=0.079$),考虑到该文的样本量只有76家合作社,因此认定合作社规模和信用等级也是有显著影响,而理事长的教育程度和认证不再有显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大部分合作社虚假出资,使得合作社注册资本不真实,导致合作社规模虽然在模型3中具有了“统计上的显著”,但实际结果与假设不同。而合作社股权结构与理事长身份对合作社规范程度均有显著影响,并且影响都很大。具体说来,身为农村能人的理事长能更好地引导合作社规范发展,股权结构更加平均的合作社也有更大概率成为规范合作社。制度表现中的政府项目和信用等级均对合作社规范程度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均为正向影响,说明了外部的资金与社会资本的支持对合作社规范发展的重要性。销售表现中仅有市场对合作社规范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了有更广泛销售市场的合作社也更加规范。

4 讨论与结论

合作社的基本能力对合作社规范程度的影响根据各指标而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合作社距离、规模、技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合作社规范程度	77	0.310	0.466	0.000	1.000
是否林业合作社	77	0.210	0.408	0.000	1.000
是否农业合作社	77	0.310	0.466	0.000	1.000
是否养殖合作社	77	0.440	0.5	0.000	1.000
规模	77	34.264	28.622	1.200	156.000
距离	77	26.504	16.42	1.900	56.700
股东背景	77	0.970	1.451	0.000	8.000
技术	77	0.040	0.196	0.000	1.000
理事长教育程度	77	2.000	0.281	1.000	3.000
理事长身份	77	0.550	0.501	0.000	1.000
理事长额外企业	77	0.510	0.837	0.000	4.000
股权结构	77	2.340	0.771	1.000	3.000
内部社会关系	77	2.672	1.073	0.000	5.000
信用等级	77	2.270	1.221	0.000	3.000
政府项目	77	0.790	1.481	0.000	5.000
认证	77	0.190	0.399	0.000	1.000
市场	77	0.270	0.448	0.000	1.000
销售渠道	77	0.340	0.476	0.000	1.000

① 如需要可以向通讯作者邮件索要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计算结果

变量	二元 Logistic 线性分析			变量	二元 Logistic 线性分析		
	模型 3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3	模型 2	模型 1
是否林业合作社	-0.453	-1.056	-1.741	股权结构	-1.997 **		-2.952 **
是否农业合作社	-1.927	-1.736	-3.726	内部社会关系	0.019		-0.290
是否养殖合作社	0.283	-1.341	-1.539	信用等级		0.300	0.936 *
规模	0.017		0.028 *	政府项目		0.635 **	0.707 **
距离	-0.028		-0.034	认证		-2.725 **	-2.836
股东背景	0.128		-0.239	市场		1.995 **	2.483 **
技术	1.907		2.161	销售渠道		-0.597	-0.967
理事长教育程度	-2.720 **		-2.679	模型总结			
理事长身份	3.357 **		4.583 **	Nagelkerke R ²	0.375	0.477	0.664
理事长额外企业	-0.387		-0.079				

** $P < 0.05$; * $P < 0.1$

术、股东背景、内部社会关系、理事长的教育程度和额外企业对合作社规范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更多是依靠经验和自身的判断，并且农业科技人员占农民的比重很低，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帮助有限^[26]，在多伦县的实地抽样中，仅有 3 家合作社有明确的技术优势，因此技术因素对合作社规范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股东背景、理事长额外企业对合作社规范程度也无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这些额外的企业的同质性太高。

合作社理事长身份和合作社股权结构对合作社有显著影响。农村能人大户丰富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备发起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准备和敏锐触角，能够把握机会实现各项利益，这与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观点相同^[1,18,23,27]。而相对平均的股权结构则是对合作社内部社员权利的一种保障，不但会提高社员的积极性，更会给社员充足的参与感和安全感，这种互惠关系可以促使合作社更加规范发展，这也是目前有关合作社“不规范”困境研究中被忽视的一点。

信用等级更高与获得政府项目支持更多的合作社发展得也更加规范。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合作社经济基础较弱，多伦县也不例外。合作社对于政府支持和融资的需求较高，政府支持对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也有正向的作用^[28]，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主要被用在重点或示范性的合作社^[3]，因此为了获取财政补贴等政府项目支持，合作社也会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但即便有了政府项目支持和农民入股的资金，合作社仍然存在资金短缺的现象，继而有融资困难，之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合作社信用状况是影响合作社融资的根本原因之一^[29]。合作社的不规范管理和运行，会对信用等级产生消极影响^[30]，出于对融资的需求，合作社需要向“规范化”发展。同时，合作社动员内部资源的能力取决于内部成员的资源禀赋和组织成本，当合作社内部资源动员能力不足时，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外部资源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规范”的合作社往往是以“市场模式”^[31]在进行生产销售活动，有着稳定的销售渠道，社员却不统一生产；同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过分依赖当地资源和市场，会导致组织间的过度竞争，还会导致其在组织规模和地域空间上扩展困难，容易走向衰落。这两种原因，使得销售表现中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对和合作社规范程度的影响不同。

合作社仍需要有农村能人牵头，带领中小社员共同发展，但不是一人大包大揽的局面，而应该是保证平均分配权力的前提下，理事长行使主要的决策权力和经营指导权力。全体社员在逐利心的驱使下，被外部的监管所监督，同时为获取更多的融资，逐渐规范自身。结合该文的结论可以发现，建设合作社快速注销机制已经迫在眉睫；而合作社的成立审查制度设计则需要尽快改进，不但应该在注册资本上排除虚假出资，更应该就股权结构和理事长的身份要求上做一定调整；另外，外部的资金支持对合作社的规范发展有促进作用，这些帮助使有困难的合作社渡过经营瓶颈期，为理事长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本，为社员提供可见的短期利益，从而鼓励合作社朝向更有效率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最后，也应该加大力度鼓励合作社“走

出去”，接受更广阔的市场的检验。

该文将研究对象着眼于农牧交错区的农民合作社，在解释合作社规范程度时，首次从农民的基本能力角度出发，也首次探究了合作社股权结构与合作社规范程度之间的关系，以及销售表现和制度表现对合作社规范发展的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农村能人在合作社规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该研究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考虑到外部风险因素对合作社的影响，这里主要指的是自然灾害、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32]，同时，合作社绩效与合作社规范程度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这也为之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方向。

参考文献

- [1] 张晓山. 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发展及其路径.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25-26.
- [2] 韩梅洁, 韩松. 论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发展.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1, 24(4): 111-115.
- [3] 李红云, 高国云. 市场视角下的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4): 130-133.
- [4] 温铁军. 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4-6.
- [5] 苑鹏. 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制度的变异现象研究. 中国农村观察, 2013(3): 40-46.
- [6] 崔宝玉, 刘峰, 杨模荣. 内部人控制下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现实图景、政府规制与制度选择. 经济学家, 2012(6): 85-92.
- [7] 马彦丽. 论中国农民合作社的识别和判定. 中国农村观察, 2013(3): 65-71.
- [8] 万江红, 管珊, 钟涨宝. 农民合作社“规范困境”现象探析——来自湖北T合作社的个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34-39.
- [9] 赵梦丽, 刘守贞. 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问题及对策建议. 安徽农业科学, 2014, 42(32): 11521-11523.
- [10] 钱淼, 李中华. 农民合作社制度的规范分析与实证考量. 农村经济, 2016(9): 8-12.
- [11] 阿马蒂亚·森, 任贇, 于真译. 《以自由看待发展》.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9-21.
- [12] Rhodes, V. J., “The Larg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as a Competitor”,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3, 65(5): 1090-1095.
- [13] Tommaso, L. D. Maria, Children Capabiliti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or India”,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7, 36(3): 436-450.
- [14] Krishnakumar, J., P. Ballon, Estimating Basic Capabiliti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pplied to Bolivia,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6): 992-1010.
- [15]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individual freedom as a social commitment. *Humanism in Busi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6-174.
- [16] Harriss, J., J. Hunter, and C. M. Lewi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Routledge, 1997, 388-389.
- [17] 李维梁, 董德利. 农村能人大户型农民合作社研究述评. 南方农村, 2012, 28(3): 48-52.
- [18] 李君, 陈长瑶.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农村能人带动效应.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3, 29(5): 486-490.
- [19] 李佳, 郑晔.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向. 社会科学研究, 2008(2): 82-85.
- [20] 邓衡山, 王文烂.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与现实检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农民合作社?. 中国农村经济, 2014(7): 15-38.
- [21] Portes, A.,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Politic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1-41.
- [22] 梁巧, 吴闻, 刘敏. 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11): 71-79.
- [23] 黄祖辉, 扶玉枝. 合作社效率评价: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43(1): 73-84.
- [24] 潘劲.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中国农村观察, 2014(2): 26-93.
- [25] 朱婷.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发育动因及作用机制分析——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3): 91-95.
- [26] 李道和, 陈江华. 农民合作社绩效分析——基于江西省调研数据. 农业技术经济, 2014(12): 65-75.
- [27] 彭莹莹, 苑鹏. 合作社企业家能力与合作社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农村经济, 2014(12): 110-115.
- [28] 黎莉莉. 重庆市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影响分析.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5): 7-12.
- [29] 邱立军. 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问题研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11): 163-169.
- [30] 顾群. 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难成因及对策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2): 130-134.
- [31] 邓衡山, 徐志刚, 应瑞瑶, 等. 真正的农民合作社为何在中国难寻? ——一个框架性解释与经验事实. 中国农村观察, 2016(4): 72-83.
- [32] 张浩, 程红鸾, 李菲. 合作社风险影响与应对程度认知研究. 中国农学通报, 2013, 29(17): 129-133.

THE INFLUNCE OF THE BASIC CAPABILITIE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ON THE DEGREE OF THERIR REGULATION*

—AN EXAMPLE FROM DUOLUN COUNTY IN INNER MONOGOLIA

Fan Shengyue, Liang Yucheng^{**}

(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Cooperatives are very important organiz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economy, and are a new bright spot in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organizations in China. With the large amount increase of cooperatives, the existence of a huge number of irregularities in cooperatives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cooperatives to play a role in organizing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among farmers, and has also resulted in the failure of the governmental support and benefits policies for cooperatives, which has seriously imped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Non-standard cooperative will occupy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the neonatal and normal cooperatives, leading to inefficient or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s, and may mislea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how far i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operatives determined by the capabilities of cooperatives by taking 77 cooperatives'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Duolun county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n systematically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charter of cooperatives, data of dividen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ecision-making were used as the forms of assessment of cooperatives.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cooperative's shareholding structure, the competent people, the credit rating, the project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ales market attached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operatives, and the cooperative which had the talented one in charge of the cooperative and equal distribution of shareholding were more likely to be normative, while the internal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background of shareholder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cooperatives. It also found that the cooperatives which have the more normalized system and a wider sales market are more likely to be more standard, which indicating that external support also has an essential impact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operatives. The basic capabilitie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degree of regulation. The competent people as chairman and the more evenly distributed ownership structure are more likely to standardize cooperatives. While, external support, such as government projects, credit rating and sales marke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standardization of cooperatives. This study further enriches and explain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tandard degree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ic ability, and provides a useful guidelin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Keywords cooperatives; Basic Capability; agro-pastoral ecotone; standardized cooperatives; capable person